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元史学概说

天津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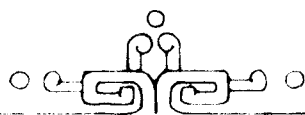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元史学概说

杨志玖 审定 李治安 王晓欣 编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 雄

书名题字 韩嘉祥

封面设计 董 建

元史学概说

杨志玖 审定 李治安 王晓欣 编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3.5印张 5插页 301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精)

ISBN 7-5309-0647-X

K·12 定价: 7.30元

7A7/10P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诸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

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资料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摘要和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处觅”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7)
第一节 元史研究的回顾	(17)
第二节 元史学科的发展趋势	(33)
第二章 专题研究成果概述	(48)
第一节 政治	(48)
第二节 典章制度	(63)
第三节 经济	(121)
第四节 社会生活	(153)
第五节 阶级、阶层与农民起义	(161)
第六节 民族	(182)
第七节 人物	(199)
第八节 文化	(206)
第九节 对外关系	(242)
第十节 历史地理	(261)
第十一节 史料整理、文物考释及语言文字研究	(267)
第三章 史料、参考书与工具书	(282)
第一节 史料	(282)
第二节 研究专著及一般读物	(324)
第三节 工具书	(332)
附录 重要论著索引	(340)

一、汉文部分	(340)
二、日文部分	(385)
三、俄文部分	(408)
四、西文部分	(415)
后 记	(424)

绪 论

公元1206年，蒙古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1227年，灭西夏。继承其汗位的窝阔台汗于1234年又灭了金朝。1260年，忽必烈作为大蒙古国第五代可汗即位。他接受并推行汉法，建中统、至元年号，又改国号为大元（1271年），八年后（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到1368年，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元朝为朱元璋所推翻。

元朝的历史应从哪年开始？有的认为应从1271年元朝建国开始^①，有的认为应从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开始^②，这都有一定道理。我们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却应追本溯源，从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算起。这样，元朝的历史便经历了163年。

一般地说，元史是研究从成吉思汗到元朝灭亡这段历史发展过程的学科，元史学则介绍、指导学习和研究元史的方法和门径。如：元史的特点，元史的重要史料和参考书，元史上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外学者对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目的在使初学者通过它了解情况，找到入门钥匙，少走弯路，减少学习上的困难；对元史学者，也许可以起到索引手册的作用，免除一些翻检之劳。

① 参见文物出版社《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及中学历史教科书。

② 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

元朝是以蒙古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王朝，研究元史当然也要研究蒙古族的历史，因此，元史和蒙古史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两门学科虽有联系，也有区别。元史是研究元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科，是断代史。其民族构成除蒙古族外，还有广大的汉族、色目人以及国内其它少数民族；而蒙古史则以蒙古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时间上自蒙古人问世的唐朝，下迄现代，是通史。二者在时限上不同，但在元朝这一阶段却有交叉，而元朝又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此，一般把元史学者作为蒙古学者，这也是讲得通的。我们只要把两者的关系弄清就可以了。

一、元史的特点

元朝历史虽不算长，但颇有特色。

第一、世界性。

蒙古国和元朝的创业者成吉思汗及其后继人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征服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他们曾征服中亚和西亚，进军东欧，建立了钦察汗（中亚咸海、里海及黑海以北，亦称“金帐汗”）伊利汗（中亚阿姆河以西、地中海以东、阿拉伯海以北、钦察汗以南）、察合台汗（阿姆河以东，天山南北一带）等汗国，又征服过东亚、南亚诸国。铁蹄所向，震撼了当时的世界，连远在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也派遣使者和蒙古联系。其时，伊朗的志费尼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征服者史》，就是记载成吉思汗到其孙蒙哥的历史。蒙古的兴起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由于和当时世界的几个主要文明区域均发生了联系，所以关于蒙古和元朝的历史，除了汉文记载以外，还有其它国家的

文字。《世界征服者史》是用波斯文写的，另一部重要的波斯文著作叫《史集》，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到他四代孙元成宗时期的历史。这两部书都是研究蒙古和元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有阿拉伯文的、亚美尼亚文的、以及欧洲各国文字（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等）的重要史料。这是世界性的表现之一。

由于和世界有关，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学者研究蒙古史和元史。如苏联、德、英、法、美、匈牙利、日本等国，都很重视这门学问，研究的成果也很可观。这是世界性的表现之二。

因此，我们研究元史既要研究中国的情况，也要兼顾与元朝有关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情况。要做到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并重，在汲取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注意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二、多民族性。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元朝尤其突出。所谓元史的多民族性，主要指元史应包括元朝管辖下为数众多的各民族的历史。蒙古族是统治民族，当然是研究的中心。此外，汉族、女真族、契丹族、藏族以及云南的白族、彝族、傣族诸民族的发展、融合，也值得注意。还有大量的西域各族，乃至从欧洲来到中国，散居各处的民族。这些人种类繁多，名目不一，因而元朝以含有诸色名目之义的“色目人”来称呼它。色目人在元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元史》和其它史料上留下了不少记录，也需要研究。研究汉族王朝的历史，以汉族的人物和文物制度为研究对象就可以了。研究元史就不那么简单。研究中经常碰到一些非汉人的人名、制

度和事物名称，不能略而不顾。这就是元史的多民族性的表现。

第三、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和北魏、辽、金、清等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一样，元朝统治者也会遇到如何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如何维护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的特权地位等问题。野蛮征服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或部分接受）被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这是一条历史法则。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进步势力顺应潮流，从仪文礼法、官制军制、农桑赋役诸方面大量采用汉地统治方式。也就是说，元朝建立后，汉法进入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后蒙古民族鄙夷定居民的自傲心理，草原蒙古贵族落后势力对汉法的抵制，蒙古统治阶级维护其特权利益的政治需要，这三者决定了忽必烈实行汉法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在采用汉法的同时，蒙古固有的一些制度，如怯薛宿卫制、投下分土分民制、驱奴制、朝会滥赐制、贵族逃汗制、官工匠制、商业上的斡脱制等等，还被长期保留下来。蒙古语也始终是法定的官方语言。大多数蒙古皇帝和贵族勋臣只使用蒙语，不懂汉语。这就形成了元代政治文化的二元性：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这种二元性，与辽朝以地域为界限的南北面官制有较大的差别。在元代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同时并存的蒙古、汉地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一般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的。其间，因地制宜的措施虽少量存在，但基本上谈不上南北异制。这就是元代政治文化二元性的梗概。

我们用蒙汉二元性来概括元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不排除其它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承认西域回回文化、吐蕃文

化对元代社会产生的某些影响，然而，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并未象蒙古法、汉法那样在国家体制中取得支配地位。相反，它们是从属于蒙古法、汉法的。因此，我们说蒙汉法二元性是元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顺理成章的。

政治文化的二元性，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元史时必须予以重视的。不注意元代历史本身的这一特点，照搬汉族封建王朝的模式去看待元史，就会遇到许多不应有的难题和困惑。

二、元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过去有一种偏见，认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就意味着社会倒退国家灭亡。其实，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哪能因为他们坐天下就算亡国呢？这种传统的偏见到今天虽然基本上克服了，但一些人对元朝的统治仍然印象不佳。应该怎样看待元朝的统治呢？

第一、从社会经济方面看

我们认为，不能不加分析地断言元朝统治造成社会经济的倒退，而应该根据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分阶段、分地区地进行观察。大体上可以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作为时间划分的标志。

元世祖以前，即大蒙古国时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其社会发展阶段、文明程度和生活习俗都与中原地区不同，又处在进行征服战争中，因此蒙古骑兵所到之处，对城市的破坏、对人民的杀戮掳掠确实很严重，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元太宗时期，甚至有蒙古人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建议“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传》）。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从游牧经济的角度来看倒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建议由于耶律

楚材的劝阻没有实行，真行起来也会遭到汉族人民的拚死抵抗。可以想见，当时蒙古统治者还不会治理汉地，这对蒙古，特别是对广大汉族人民，都是有害的。

但是，蒙古统治者要想在汉地站稳脚跟，非适应汉人情况不可。事实上，耶律楚材的任用已逐渐改变了一些蒙古的办法。这是时代的要求。元世祖即位以后，更加自觉地适应了这一要求。

元世祖即位前，已主动接近汉人学者，向他们征询治国之道，他即位后，任用汉人，采行汉法。他说：要“使百姓安业力农”，这事蒙古人不懂，非汉人不行。他重视农业，鼓励生产，设立司农司，专掌农田水利事业；又由司农司编了一部《农桑辑要》，颁行天下，传播农业技术知识。这部书在元代印行过几次，最多的一次印了一万部，可见它流传之广泛。此外，还有元仁宗时王桢写的《农书》，元文宗时畏兀儿人鲁明善写的《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的编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世祖以后农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棉花的种植已推广到长江流域，关中地区也有种植。苧麻已在河南栽种。而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具和技术传到上海松江一带，提高了当地棉布产量和织布技术，更是值得一提的经济事件。

在商业方面，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于当时中国商业的记述可看到商业的繁盛情况。他有一章专记“汴八里（今北京）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这里“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京兆城（今西安）“工商繁盛，产丝多”。类似的词句，在他所到之处使用得相当多。他还说，刺桐（今泉州）为“世界最大良港”。

之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马可波罗称赞元世祖是“人类元祖阿瞒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未见广有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①，虽有夸张之嫌，但若无当时经济发达的背景，他也不会有这番话的。

再就地区来看，华北、长江以北地区由于战争频繁持久，经济破坏较严重，恢复较慢。而在江南南宋统治地区，由于战乱较少，又有过去发达的基础，经济一直是发展的。从马可波罗关于行在（杭州）的繁华富庶情况的描绘也可可见一斑。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就元朝统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说，不应只看到初期的破坏方面，也应该看到元世祖即位后的恢复发展方面；不应只看到北方初期的破坏，也应该看到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从政治方面看

元朝的统治确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如把民众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人在政治和法律上待遇不平等。这种民族歧视和分化政策是元世祖时期制定的，说明这位开明君主也不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民族偏见。而这一项政策不仅加剧了民族矛盾，也是引起元末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当然不应忽视阶级矛盾）。但是，元朝的统治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如：

1. 开放政策 元代中外交通发达，无论从陆上或海上，都有许多外国人来华。对域外人员元朝政府始终持优容和欢迎态度。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和他父亲、叔父从陆路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7年，备受优待，最后从海路返回故乡。对外来事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册379页、413页、609页、611页，28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物，元政府也不排斥。如天文历法，除了采用汉人郭守敬的《授时历》外，还采用回回人札马鲁丁的《万年历》。

2. 宗教宽容政策 元朝容许各种宗教的传播，并优待教士，免除寺院的一些赋役负担。当时除中国已有的佛教和道教外，还有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藏的喇嘛教。他们都建有寺院，拥有不少教徒。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3. 思想放任政策 由于蒙古统治者文化低，思想单纯质朴，没有条条框框，因此对汉人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论不加干涉，没有采取思想统治或控制政策。元人杂剧中有许多愤世嫉俗或抨击时政的言词，过去多认为是元朝政治黑暗腐朽的反映，这当然有道理。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词曲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不正说明元政府对这些作品未作干涉吗？

顺便提一下元代儒士的地位问题。当时有人说，儒士地位很低，所谓“九儒十丐”，即儒士地位仅高于乞丐而在其它人等之下。这是南宋遗民谢枋得和郑思肖出于亡国的激愤之情而发的牢骚，并不是实情。谢枋得在《谢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开头就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可见他本人也知道这是“滑稽之雄”对儒士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元代儒士的地位虽不十分高，但可以享受免除赋役的待遇；在元世祖以前，儒士被俘为奴隶者即被释收，更不用说还有些儒士进入仕途的了。

4. 轻刑政策 一般想象，元朝以武力得天下，刑罚一定残酷，其实不然。《元史·刑法志》说，元初“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元世祖统一后则“简除繁苛，始定新律”，也就是有所减轻。又说“元因之（指五刑——引者）更用轻典，盖亦仁

矣”。“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刑法志》总结说：“然则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驰而不知检也。”这些可能有明初史臣（多元末遗民）溢美之辞。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如五刑中的笞刑和杖刑，过去都是从十下开始，现在则减三为七。。据说这是元世祖定的，为的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叶子奇《草木子》）。叶子奇又说，当时的犯人虽然定了死罪，也不加刑，最后老死在监狱里。因而七、八十年看不见杀人的事，偶而见到一个死人头，大家就很惊恐。这可以和《元史·刑法志》印证。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或者从客观效果看，元朝的统治在历史上还是有它的积极面的。主要是：

第一、国家的大统一 从唐末五代到元代的统一，将近400年，中国陷于分裂的局面。即令在盛唐时期，吐蕃、南诏、回纥也只是和唐政府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到元朝，边疆和内地才真正形成一体。云南和塞北成为元朝的两个行省（云南、岭北），吐蕃归设在大都（北京）的宣政院直接管理，今新疆维族居住区设立宣慰使管辖，东北全境由辽阳行省统一管理。真所谓四海一家，无此疆彼界之分了。这是我国历史上从唐朝以后一次规模空前的统一，对于我国疆域的奠定和边疆的开发，都有重大的作用。

第二、民族的大融合 在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下，我国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更加强了。蒙古族以前住在大漠南北，现在则通过从政、驻防、屯田等关系大量移居内地，有的跑到云南，在那里安家落户。西夏人、畏兀儿人也有很多散居内地。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于和汉人接触较早，在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大部与汉人融合，此时便被称为汉人。同

时，契丹这一名称又被蒙古、中亚和欧洲人作为中国北部和北部汉人的统称。至今俄文“中国”一词仍为“契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大批到中国来，被称为回回人，他们逐渐说汉语，用汉文，因而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回族。这些民族由于长期和汉人接触，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还有一些政绩卓著的政治家和科技人才。他们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第三、中外交通的发达 由于蒙古势力的扩展，元代中外交通很发达。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比以前更畅通了，而且更加安全。在陆路上设有驿站（元代叫站赤），由专人管理食宿，供给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匹）。由大都或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西去可达地中海或黑海沿岸城市。海上交通从泉州出发，可以到达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洲等地。各国的商人、使节、传教士和我国的使节、商人等时常往来于这两条道上，尤以西方人来的最多。其中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家最为著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和他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想到东方来有关。

中外交通的发达带来了中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印刷术这时先传到伊朗，以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纸牌也是这一时期传到欧洲的。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他们称之为“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又从那里传到欧洲，对攻破封建贵族堡垒，摧毁封建制度起了一定作用。有趣的是，阿拉伯人的抛石机（回回炮）在元世祖时传到中国，攻破了南宋的襄阳和樊城，对元朝统一中国发挥了作用。阿拉伯人的天文仪器和历法（回回历、